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 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

A Study on Shen Deqian's Poetic Thoughts

王宏林 © 著

 人民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 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

王宏林 ©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 / 王宏林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01-008804-4

I. 沈… II. 王… III. 沈德潜(1673~1769)—诗歌—文学理论—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 第 051085 号

---

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

SHEN DEQIAN SHIXUE SIXIANG YANJIU

王宏林 著

---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张旭

封面设计:阳洪燕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65289539

印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版次: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3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310千字

书号:ISBN 978-7-01-008804-4

定价:39.80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CONTENTS

导 论 .....	1
第一章 《古诗源》研究 .....	12
第一节 《古诗源》对前代古诗总集之传承	12
一、《古诗源》与《古今诗删》《古诗选》	14
二、《古诗源》与《古诗纪》《古诗归》	16
三、《古诗源》与《采菽堂古诗选》	19
第二节 《古诗源》对古诗发展风貌的构建	22
一、汉魏有别,崇汉贬魏	22
二、陶渊明与晋诗正变	26
三、谢灵运与刘宋之风	28
四、谢朓与齐梁近体之兴	30
第三节 《古诗源》评选的总体特点	33
一、通过鉴赏进行批评	33
二、溯唐诗之源	37
第二章 《唐诗别裁集》研究 .....	41
第一节 沈德潜唐诗选本版本源流考辨	41
一、《唐诗宗》不分卷本	41
二、《唐诗宗》十七卷本	44

三、《唐诗别裁集》十卷本	45
四、《唐诗别裁集》重订本	46
第二节 沈德潜对唐诗风貌的构建	49
一、以李、杜为宗	49
二、兼及中、晚唐	52
三、提倡“雄浑阔大”	57
第三节 沈德潜的杜诗论	59
一、《唐诗别裁集》与《杜诗偶评》	59
二、“诗之变，情之正”——沈德潜论杜诗宗旨	62
三、“神明变化于其中”——沈德潜论杜诗法度	68
<b>第三章 《宋金三家诗选》研究</b>	<b>73</b>
第一节 宗宋诗风与《宋金三家诗选》之成书	73
一、《宋金三家诗选》对前代宋诗选本之借鉴	74
二、《宋金三家诗选》对宋诗的定位	77
第二节 《宋金三家诗选》的诗学倾向	82
一、沈德潜对宋诗风貌的看法	83
二、以杜诗为旨归	85
<b>第四章 《明诗别裁集》研究</b>	<b>91</b>
第一节 《明诗别裁集》与前代明诗选本的关系	91
一、唐宋之争背景下明诗的地位	92
二、从以诗补史到标举典范	93
三、《明诗别裁集》对前代明诗选本的继承	96
第二节 《明诗别裁集》对明诗发展风貌的概括	99
一、明诗选本对七子派的争论	100
二、《明诗别裁集》对其他诗歌流派的评价	108
第三节 《明诗别裁集》的审美倾向与作品选评	115
一、先审宗旨，次论格调	115
二、《明诗别裁集》对原作的删改	119
三、《明诗别裁集》对前代诗话的借鉴	125

**第五章 《清诗别裁集》研究**..... 131

- 第一节 《清诗别裁集》版本流变 131
  - 一、番刻本 132
  - 二、重订本 134
  - 三、御定本 136
- 第二节 沈德潜对清诗发展风貌的概括 138
  - 一、清诗概况 139
  - 二、清诗大家 142
  - 三、宗宋诗风 149
  - 四、地域与故旧色彩 153
- 第三节 《清诗别裁集》的评点特色 156
  - 一、清人论诗对沈德潜的影响 157
  - 二、自身经历在诗选中的体现 158
  - 三、杜诗的典范意义 160

**第六章 沈德潜的儒家诗学立场**..... 162

- 第一节 沈德潜对儒家传统诗论的推崇 162
  - 一、政治伦理价值优先 163
  - 二、委婉含蓄的写作手法 167
- 第二节 沈德潜儒家诗学立场评诗选诗之表现 172
  - 一、古逸诗与伪诗的入选 172
  - 二、民间乐府的选录 174
  - 三、对明七子四大家的选录 177
- 第三节 沈德潜后期诗学的变化 181
  - 一、对儒家诗教的极端推崇 181
  - 二、重视性灵与接受宋诗 191

**第七章 沈德潜的格调论**..... 195

- 第一节 明清创作风尚与格调论的产生 195
  - 一、从风骨、意境到格调 196

二、格调的基本内涵	200
第二节 考辨源流、取法乎上——沈德潜格调论的内容	208
一、乐府	208
二、四言古诗	214
三、五言古诗	216
四、七言古诗	222
五、五言律诗	226
六、七言律诗	230
七、绝句	234
第三节 注重创格、终流神韵——沈德潜格调论的新变	238
一、创格与尊体	238
二、推崇神韵	241
<b>第八章 沈德潜与清代诗学思潮的离合</b>	<b>247</b>
第一节 沈德潜与清代诗学思潮	247
一、清初诗坛经世思潮的兴起	248
二、沈德潜对王士禛诗学的接受与回应	250
三、沈德潜对叶燮诗学的改造	253
四、乾隆对沈德潜的影响	255
第二节 沈德潜与乾嘉考据之风	260
一、乾嘉诗人与考据家之关系	260
二、乾嘉学风对传统诗学命题的修正	265
<b>结 语</b>	<b>269</b>
<b>附录 沈德潜年表</b>	<b>272</b>
参考文献	288
后 记	298

## 导 论

中国诗学的发展与作品的编辑息息相关。《诗经》自不必言，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六朝萧统《文选》和徐陵《玉台新咏》等总集均对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唐、宋、元时期，选家们在编选作品的同时也注重对作品的评点，使总集的批评功能大大加强。明、清两代是中国古典诗学发展的高潮，众多诗学大家对诗歌风貌的构建、诗歌名篇的筛选及历代诗人的褒贬主要是通过选本而直接体现的，沈德潜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卒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乙未（1739）进士，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乾隆第二次南巡时（1757）赐礼部尚书职衔，时称大宗伯，卒谥文愬。沈德潜前后参加岁试、科试几十次，乡试十七次，应博学鸿词两次，中进士时已是67岁高龄，入朝为官后并无显著政绩，只是与乾隆的关系颇为密切。乾隆自称与沈德潜以诗始以诗终，<sup>①</sup>并为沈德潜诗集作序，但沈德潜去世后因徐述夔《一柱楼诗》一案<sup>②</sup>被扑碑削谥，其经历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是很独特的。

① 沈德潜《自订年谱》：“十四年己巳（1749），年二十七，患瘖未愈，上命大司马梁诗正传旨：‘沈德潜不必到上书房，许其归里，享林泉之乐。朕与之以诗始，亦以诗终，令其校阅诗稿，校毕起行。’”（《沈归愚全集》第一册，乾隆教忠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② 徐述夔为乾隆三年（1738）举人，去世后其诗集《一柱楼诗》由其子徐怀祖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行，因内有“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等触犯清廷时忌的内容，被蔡氏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告发，此案涉及甚广，包括江苏布政使陆琰等六人被处斩。沈德潜虽已去世，也被革去官爵、加衔和谥典，并仆毁御制墓碑，撤出乡贤祠。（详见郭成康、林铁钧著：《清朝文字狱》“乾隆查办禁书与徐述夔诗狱”部分，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54页。）



作为清代格调派的代表,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古诗源》《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和《宋金三家诗选》中对历代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各种诗体的典范作品以及诗歌的创作鉴赏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意见,可以说,其丰富的诗学主张和巨大的影响力与这几部诗选密不可分。因此,本书对沈德潜诗学思想的考察将以这几部选本为基础。下面先对选本的基本原理和沈德潜诗学的研究现状加以简要论述。

在传统目录学分类中,选本与全集同属总集类,但两者其实有明显区别。选本往往有明确的编撰意图和选择范围。《四库提要》“总集类叙目”谈到总集编撰的原因有两个:“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sup>①</sup>前者实为全集,重在求全责备。后者则是选本,重在去芜取精,故需对作品有所限定和选择。另外,选本往往具有群体性特点,这是它与别集的主要不同所在。尽管选本、全集和别集区别明显,但在传统的四部分类中一直同属于集部,联系颇为密切。选本以全集和别集为母体,全集往往倾一国之力或个人毕生心血而成,规模宏大,编选颇为不易,故不如选本易于成书和流传。别集虽然数量众多,但往往新集日增、旧编日减,历久不可泯灭者代不过数人,但许多作者却借选本而被后人所知。因此,在流传的广泛性、长效性方面,选本有着别集和全集不可比拟的优势。

选本和诗文评类著作也有密切关系。由于选本都具备一定的目的性,必然有其选择意图和标准,自然能够如诗文评类著作一样体现出编选者的审美趣味。《隋书·经籍志》即把选本和诗文评类著作视为一类,同属总集: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摛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sup>②</sup>

在总集之下,既包括“采摘孔翠,芟剪繁芜”的选本,还有像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这类纯粹“解释评论”的诗文评类著作,为什么时人未对两者

① [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98页。

② [唐]魏征等:《隋书》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武英殿本,第131页。

加以区分呢？

从传统目录学分类来看,《诗经》列入经部,《楚辞》在集部又自成一类,因此挚虞的《文章流别》一般被视为选本之始。此书在历代目录著作的书名和卷数各不相同,①但大体而言,包括集、志、论三部分则是没有问题的。《文章流别志》是《流别集》的序目,所以《隋志》《通志》均列其书入史部目录类;《文章流别集》是总集,主要是收录作品;《文章流别论》则是《流别集》的个体叙论,说明各种文体的源流、作法及代表作家作品,按其性质应归入《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诗文评类。从这种情况来看,这部最早的选本《文章流别集》和诗文评《文章流别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显然,选本固然有“采摘芟剪”的功能,但同时也具有批评赏鉴的意味,两者具有很多共性,这恐怕是长期以来目录学著作并未对两者加以区分的原因。

此后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把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和总集类三类,又在总集类中首次单独列出文史类,其云:

凡文史类四家,四部,十八卷。刘子玄以下不著录,二十一家,二十三部,一百七十九卷。②

此“文史类四家”分别是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颜竣《诗例录》和钟嵘《诗品》,欧阳修在这里称之为“文史类”,《四库全书总目》称之为“诗文评类”,名目虽然不同,但所指对象并无差别,可见欧阳修已经意识到这类作品和总集中的全集和选本性质不同,故加以区分。《新唐书》把两者区分之后,《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和《明史·艺文志》均沿袭这一做法,把文史类从总集中独立出来。至《四库总目》,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和词曲五类,选本和诗文评遂判然两途。

选家在编撰选本时,所选用的编选体例十分重要,往往透露出作者的编选

① 按,[梁]阮孝绪《七录》著有“《流别集》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类有挚虞《文章志》四卷,集部总集类有《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之后,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郑樵《通志》、焦竑《国史·经籍志》都著录此书,但卷帙各有不同。

②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六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武英殿本,第170页。

意图。孙琴安先生对历代唐诗选本的编排体例有一个简要的概括：

有从音韵的角度来加以排列的，如施端教的《唐诗韵汇》、焦袁熹的《此木轩唐五言律七言律读本》；有从内容题材的不同来加以分门归类的，如张之象的《唐诗类苑》、胡以梅的《唐诗贯珠》；有从艺术风格的区别来加以编排的，如唐汝询的《汇编唐诗十集》、鲍桂星的《唐诗品》；有以诗体编排的，如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王夫之的《唐诗评选》；有以诗人先后而不分诗体排列的，如乔亿的《大历诗略》、马允刚的《唐诗正声》；有将时代先后和艺术风格结合起来而加以编次的，如黄周星《唐诗快》；有将时代先后、艺术风格、诗体分类三者结合起来而加以排列的，如高棅的《唐诗品汇》；有或以诗体排列、或又不以诗体排列的，如杨士弘的《唐音》<sup>①</sup>。

孙氏把历代唐诗选本的编选体例概括成按音韵、内容题材、艺术风格、诗体（即体裁）、诗人先后和多种标准的结合等方式，大致涵盖了整个选本的编选情况。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类选本明显受到纪传体史书编撰体例的影响，它们往往在先后顺序之中蕴涵着强烈的褒贬态度，颇有“春秋笔法”特色。如金元好问编《中州集》，“首录显宗二首、章宗一首，不入卷数。其余分为十集，以十干纪之。……壬集自马舜之下，别标诸相一门，列刘豫等十六人；状元一门，列郑子聃等八人。”<sup>②</sup>程嘉燧即评论道：“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sup>③</sup>清钱谦益仿《中州集》所编《列朝诗集》，首为乾集两卷，录帝王诗；次甲前集、甲集、乙集、丙集、丁集，录各代之诗；次闰集，录僧道、香奁、外国等人诗品。其在自序中说：“曰：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止于丁者何居？曰：癸，归也。于卦为归藏。时为冬令，月在癸曰极。丁，丁壮成实也，岁曰强圉。万物盛于丙，成于丁，茂于戊。于时为朱明，四十强盛之年也。金镜未坠，珠囊重理，鸿朗庄严，富有日新。天地之心，声文之运也。”<sup>④</sup>似乎这种编选体例暗喻有期望明室复兴之意。钱谦益在序中又说：“然则，何以言集，而不言

① 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 [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四十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29页。

③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自序”所引，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

④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

选?曰,备典故,采风谣,汰冗长,访幽仄,铺陈皇明,发挥才调,愚窃有志焉。”按照此言,则存史是主,选诗倒在其次了。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诗歌选本采用不同的编选体例,批评色彩的浓淡往往是不同的。以题材为序编成的诗歌选本往往没有太多的批评价值,这类选本的关键是确立分类的名目,由于唐代以来产生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几部著名的类书,诗选的名目很容易确立,编者只需把相关内容的诗作分类抄录即可。因此,按题材而编撰的诗选理论意味大多薄弱,其在批评史上的影响非常有限。

以艺术风格或效仿史书而编撰的诗选具有最直接的批评意味,编者的审美趣味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篇章名目的安排。如《唐音》设始音、正音和余响,正音收录的作家自然代表正宗。《唐诗品汇》每种诗体下所设的九个名目,处于正宗和大家地位的诗人显然成就最大。二是对诗人位置的安排和评价。在《中州集》和《列朝诗集》中,编者者常常把同一流派或相似特征的诗人安排在一起,著名人物后往往附见其他人,或是同门弟子,或是同一流派。每位诗人都有详细的小传,论述诗人的生平以及诗风的形成,非常类似史书中列传的写法。这类诗选小传的论述十分详细,常常揭示该诗人创作的得失、在诗史上的位置等。这类选本由于个人主观色彩鲜明,常常引起后世的争论,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也比较显著。

以体裁编撰的诗选是近体诗成熟之后的产物,尤其是明代格调派兴起以来,辨体风气日盛,这类选本渐渐增多。每种诗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会形成独特的审美风貌,这类选本就是通过选诗来确立某种诗体的传统和典范。因此,按体裁编撰的诗选最能体现某一诗派的审美理想。编者者不仅仅选诗,一般还对诗人和作品加以点评。由于审美倾向的差异,对同一对象的点评往往差异明显,论诗宗旨的体现相应比较鲜明。此类诗选的体裁次序虽然各异,不过大都是先古体后近体,如陈子龙《皇明诗选》按古乐府、五古、七古、五律(附五言排律)、七律、五绝、七绝的顺序编排;王夫之《明诗评选》按乐府、歌行、四言、五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的顺序编排;等等。

以诗人生年或登第顺序编撰的诗选最为常见,这也是编撰全集最常用的体例。这类诗选的编选体例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编选者的审美倾向主要体现在对

诗人、诗作的取舍和入选数量上。由于这类诗选体现的批评意义最为隐晦,往往需要结合其他材料才能准确把握。

总体而言,诗歌编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式,会影响到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编选者的文学趣味和批评观念既可以通过诗人和作品的取舍来间接体现,也可以通过序、跋、编选体例和评点直接表明。不过诗话、序、跋、书信等文体在论述某种文艺现象时,难免受时代风气、当时情景或斗争策略的影响,或口是心非(如谈功用无不言儒家诗教),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如李攀龙言唐无五言古诗),如果只关注这类材料所包含的观点,忽略文人心态和时代背景的考察就难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诗选很少出现陈陈相因的情况,俗话、套话、场面话是选诗和评点的大忌,即使是诗学主张相同的选本,编选者也会在编排和评点时尽量体现自己的特点。因此,诗选与诗学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它能真实而直观地体现编选者的文学观念。

沈德潜是继王士禛之后在清代诗坛产生巨大影响的诗论家,常被视为乾隆前期诗坛之盟主,其倡导的“格调说”在清代中期影响甚大。对沈德潜诗学的研究是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而逐渐深入的。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多注重对文学批评整体风貌的概括。朱东润说:“归愚盛推汉、魏、盛唐,故会心所在,乃属明代之何、李、李、王诸公。……归愚论诗,主张最力者,则为其温柔敦厚之说。”<sup>①</sup>郭绍虞说:“昔人之述归愚诗论者,或举其温柔敦厚,或称其重在格调,实则仅得其一端。归愚诗论,本是兼此二义的。”<sup>②</sup>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大陆学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把沈德潜所倡导的格调论和诗教说视为复古思想和儒家传统的代表大加批判,但各家同时也指出沈德潜诗学理论中不乏合理之处。90年代以来,沈德潜诗学的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邬国平、王镇远先生《清代文学批评史》承继郭绍虞先生的有关论述,更加细致地探讨了沈德潜的论诗宗旨;张少康先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不但辨析了沈德潜与叶燮、明七子的差异,揭示出沈德潜诗学思想的根源,还对沈德潜的创作理论作了详细的论述;张健先生《清代诗学研究》立足于明清诗学发展的背景,细致考辨了沈德潜与七子派、云间派和神韵派的承继关系,重新建构了沈德潜的诗学

①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05~306页。

②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08页。

体系。

此期也有多篇论文开始关注沈德潜诗歌选本。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6届博士生王伟的《〈清诗别裁集〉研究》是一篇比较难得的以沈德潜诗选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全文约21万字,该论文分为引论及上篇、下篇三个部分。引论主要说明选题的缘起和意义;上篇侧重于对《清诗别裁集》进行内部分析,以《清诗别裁集》之选‘江左三大家’、王士禛、叶燮为切入点,考察选家沈德潜的诗学理想和选诗原则;下篇侧重于外部研究,深入讨论了《清诗别裁集》‘温柔敦厚’的选诗原则和沈德潜的诗学理论‘格调说’的根本内涵,并讨论了沈德潜的诗学对于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sup>①</sup>黄福康先生《〈宋金三家诗选〉与沈德潜诗论》(《文史杂志》1988年第3期)指出沈德潜以儒家诗教传统和唐诗的格调为依归,对苏轼、陆游和元好问进行了选评,“除了贯彻他的诗论外,也还顾及了三家内容的基本倾向及艺术特色”。王顺贵先生《沈德潜与〈宋金三家诗选〉》(《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联系《说诗碎语》对宋代诗人的评价,认为沈德潜对苏轼、陆游多有肯定,不能一概认为沈德潜是“宗唐贬宋”。冯保善先生《沈德潜与〈古诗源〉》(《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5月第7卷第3期)认为《古诗源》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唐前诗歌发展的轨迹和创作成就,也存在取舍失当之处。从各个角度对沈德潜诗论的得失、选诗宗旨进行了探讨。

《唐诗别裁集》作为一部经典唐诗选本一直是诸家研究的焦点。孙琴安先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唐诗选本:介绍〈唐诗别裁集〉》(《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3期)对此选的选诗特点进行了介绍。陈新璋先生《评沈德潜在唐诗学上的建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沈德潜的唐诗观“能接受前人合理的论见,克服明显的偏颇”,并“对唐诗的普及和研究有较高的价值”。武菲先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的编选标准》(《成都大学学报》2007年1月第21卷第1期)论述了宗旨、体裁、音节和格调四条编选标准的内涵及体现。

《唐诗别裁集》选诗以杜甫为最,且沈德潜有《杜诗偶评》专选,故诸家对沈德潜的杜诗论也相当重视。胡可先先生《沈德潜杜诗学述略》(《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对沈德潜的论杜诗之语进行了总结和探讨,认为沈德潜视

<sup>①</sup> 《博士论文撷英·〈清诗别裁集研究〉》,载《长江学术》2006年第4期,第171页。

杜甫“集古诗大成,为唐诗正宗”,“杜诗温柔敦厚之旨,又与他忠君爱国的精神联系在一起,构成杜诗现实主义的精髓”,论文还对沈德潜对杜诗渊源的论述进行高度评价,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沈德潜的杜诗学概况。袁志彬先生《沈德潜及其杜诗论》(上、续)(《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3、4期)立足于沈德潜的格调理论,阐述了沈德潜对杜甫诗歌的思想内涵、风格、“议论”、“体裁”和“章法”的高度推崇,并指出其杜诗论的局限。

就研究现状而言,各家研究主要集中于沈德潜的格调理论、诗教理论、唐诗学和杜诗学等四个方面,尚存三个不足:第一,基本材料的辨析尚有欠缺,沈德潜选本跨度达五十多年,其间修订多次,研究者尚未注意到各个版本之间的不同及其所反映出的诗学主张的不同。比如沈德潜的唐诗选本有四部,分别是《唐诗宗》不分卷本、《唐诗宗》十七卷本、《唐诗别裁集》初编本和重订本,前三部唐诗选本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第二,对沈德潜多部选本的选诗与评点注意不够,研究者较少通过与同类选本的比较来探讨沈德潜的诗学思想。第三,很少联系清代中期诗学的发展背景来探讨沈德潜的诗学。沈德潜为乾隆诗坛风云人物,其诗论的发展变化与时代思潮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此历史背景的考察将有助于揭示其诗学面貌。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大都认识到文学研究不能立足于文学概论的框架,通过填充一些材料来论证某些问题,最关键的是借助耙梳文献来揭示历史的原貌,从而对文学史形成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沈德潜诗学的研究也应如此。

沈德潜作为清代中期格调说的代表,其诗学在当时和后世均有广泛影响。除沿用传统的序、跋、诗话等文体外,沈德潜非常重视编撰诗歌选本。从40岁编《唐诗别裁集》到97岁编《宋金三家诗选》,沈德潜共编撰七部诗歌选本,其中唐诗和清诗选本均修订多次,一生的诗学活动可谓以选诗始,以选诗终。这些诗选针对前代选本和当代诗学思潮而精心编撰,既有系统性,又富有理论价值,对作家作品的评鉴多有精妙之论,至今仍盛行不衰,其蕴涵的学术价值也是不言自明的。从三部《别裁》《古诗源》和《宋金三家诗选》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诗歌史观,即唐诗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古诗为诗歌的源头,明诗和清诗承继唐诗发展而来,其所建构的中国诗歌发展史是古诗、唐诗、明诗到清诗,把宋、元诗视为中国诗歌的旁流,但又承认苏轼、陆游和元好问的巨大成就。如果结合诗选中

的作品的编选和评点,可以发现沈德潜在承继前人诗学的同时,对具体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某种诗体的典范作品以及诗歌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不少新的见解。从批评史的角度而言,沈德潜的七部诗选的意义和价值并不相同,其中《唐诗别裁集》《古诗源》《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和《宋金三家诗选》都包含有丰富的批评内容,它们构成了沈德潜心目中的诗歌发展流变史,这几部诗选将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杜诗偶评》只选杜诗,主要辑录《唐诗别裁集》相关评论而成,故本书于《杜诗偶评》重点考证其版本流变,对其中的诗学理论主要在《唐诗别裁集研究》一章中加以论述。《七子诗选》只是辑录清代七家作品,诗学批评意义并不突出,故本书不再单独论述。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重视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沈德潜诗歌选本的版本源流。特别是《唐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都历经多次修订,当前只是排印出版了两选的重订本,其他版本不太常见,故本书将详细论述这些选本的主要内容和编选过程。另外,沈德潜对前代选本多有参照和借鉴,考察沈氏选本和前代选本的关系也是本书的一个重点。

探讨沈德潜诗学理论是本书的核心,但与前人研究最为重视《说诗晬语》不同,本书主要依据入选诗作和评点来考察沈德潜诗学思想的传承流变及主要内容。笔者非常认同蒋寅先生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所倡导的“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

文学史研究就是要通过耙梳文献,对文学现象做一番整理、复原、剖析的工作,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对文学史的流变做一个全景式的观照,从而对文学史形成全面而深刻的认识<sup>①</sup>。

蒋寅先生还谈到了“过程”所辐射的问题呈现为至少八个方面:作家交往和文学史形成的具体过程;作家文学观念与文坛风会交互影响的过程;选本在作家文学观念与时代文学思潮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个人在文学过程中的意义和发现新的文学史事件对过程认识的意义;理论命题的展开过程呈现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文学史过程展开的多侧面或者说影响到过程的多重因素;充分注意文

<sup>①</sup> 蒋寅:《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参见《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学史事件中的非文学因素对理解文学史过程的复杂性的意义;作品编辑和传播介入文学史过程的特殊方式——伪书所传达的信息。并联系王士禛的研究对八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并在著作中逐一展开。这种研究方式给予笔者极大的启发。在笔者看来,就“选本在作家文学观念与时代文学思潮形成过程中的意义”而言,沈德潜表现得最为突出。沈德潜最早编选《唐诗别裁集》正是缘于清初宗宋诗潮的兴起。受严羽诗论影响,《唐音》《唐诗品汇》到《古今诗删》这些唐诗选本有意改变唐宋人选唐诗的诗学倾向,使严羽“诗必盛唐”的诗学取向通过作品具体化,从而形成了明代诗学的复古主义特点。清初宗宋诗潮是在反对七子的背景下发生的,《唐诗别裁集》是对这股气势汹涌的宗宋诗潮的反驳,所以他重新回到七子的格调立场。其对作品的遴选、诗人地位的评价,均与《唐诗品汇》《古今诗删》《唐贤三昧集》这些前代唐诗选本有密切的关系。只有进入沈德潜选诗、评诗的“过程”,才能切实把握沈德潜诗学的真谛。因此,本书主要通过沈德潜对各个时代诗歌的选择、评点来探讨其中所蕴涵的诗学观念。一般而言,编选者的文学趣味和批评观念虽然可以通过序、跋、编选体例和评点直接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诗人和作品的选择之中,因此本书的研究方法首重定量分析法和比较法,通过各部诗选的选诗数量和评点,并结合其他诗学文献来勾勒沈德潜的诗学观念及其流变。另外,沈德潜既是诗人又是诗论家,长期沉沦之后晚年显达,更难得的是诗学活动贯穿其一生,多次处身于诗坛论争的中心,这种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对其选诗也有重大影响。沈氏选本不仅像一般选本那样品评高下、考辨流变,还有很多谈创作体会和诗坛交游的内容。因此,从其他七个方面展开对沈德潜的研究也具有特殊的价值,也是笔者努力的方向。

就全书结构安排而言,导论部分简要论述选本的基本原理和沈德潜诗学研究现状。正文分八章,前五章以时代为序,对沈德潜《古诗源》《唐诗别裁集》等五部重要诗歌选本进行个案考察,重点探讨沈德潜诗选与前代选本的渊源关系和沈德潜对各个时期诗歌发展风貌的构建,以便直观展示沈德潜通过诗选所建构的中国诗歌史。后三章分别探讨沈德潜论诗宗旨、格调论及沈德潜诗学与清代诗学思潮的关系,对沈德潜诗学思想集中进行论述。附录是《沈德潜年表》,以沈德潜自订《年谱》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简要展示清代前中期近百年的诗